

北京专史集成

主编 王岗

# 北京著述史

本书主编 赵雅丽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专史集成

主编 王岗

# 北京著述史

本书主编 赵雅丽

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著述史 / 赵雅丽主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北京专史集成》/ 王岗 主编)

ISBN 978-7-01-010661-8/

I. ①北… II. ①赵… III. ①图书史-北京市

IV. ①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8857 号

## 北京著述史

BEIJING ZHUSHUSHI

---

丛书主编: 王 岗

本书主编: 赵雅丽

出版策划: 张秀平

责任编辑: 张秀平

装帧设计: 曹 春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www.peoplepress.net](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厂: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5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10661-8/

定 价: 75.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 《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组成员

总顾问：刘牧雨

总策划：戚本超

主 编：王 岗

特聘学术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王钟翰、陈高华、林甘泉、赵其昌、徐莘芳、曹子西、龚书铎、蔡美彪、戴 逸

名誉顾问：陈之昌

执行策划：王 岗、李宝臣、刘仲华、章永俊

编委会主任：李宝臣

编 委：王 玲、尹钧科、阎崇年、王灿炽、吴建雍、于德源、李宝臣、孙冬虎、袁 熹、王 岗、吴文涛、郑永华

分卷主编：（见各卷）

课题组成员：王 岗、尹钧科、吴建雍、于德源、李宝臣、袁 熹、邓亦兵、孙冬虎、吴文涛、何 力、郑永华、刘仲华、张雅晶、赵雅丽、章永俊、何岩巍、许 辉、张艳丽、董 焱、王建伟

课题组特邀成员：张 泉、齐大芝、赵志强、徐丹俊、李建平、韩 朴、谭烈飞、马建农、姚 安、邓瑞全、郝志群、宋卫忠等

**本书主编：赵雅丽**

**本书撰稿人员（以姓氏笔划排序）：王 岗、董 焱、  
何岩巍、刘仲华、王建伟、章永俊、张艳丽、郑永华、  
赵雅丽**

# 序

北京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30年来，在全所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一些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其中，又以曹子西先生主编的《北京通史》为代表，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而《北京通史》的问世，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2006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加大扶持力度，提出把《北京专史集成》列入院科研重大课题，使得我院的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从整体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历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始对北京专史进行研究，如王玲女士撰写有《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尹钧科先生撰写有《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于德源先生撰写有《北京农业经济史》，吴建雍等人合写有《北京城市生活史》、《北京城市发展史》，等等，这些专史的问世把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但是，要想形成一套体系完备的专史研究系列，显然仅仅依靠个人的研究力量是不够的，必须组成一支力量相对强大的科研队伍，才能够完成系列专史研究的繁重工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领导组织历史研究所的全体科研人员对《北京专史集成》课题进行了认真的论证。特别是课题总顾问刘牧雨院长和课题总策划戚本超副院长对课题中研究项目的编写原则和立项次序都给予了精心指导。经过论证，初步确定了《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的第一批研究项目，即：

1. 北京政治史；
2. 北京经济史；
3. 北京农业史；
4. 北京手工业史；
5. 北京商业史；
6. 北京军事史；
7. 北京文化史；
8. 北京文学史；
9. 北京美术史；
10. 北京学术史；
11. 北京著述史；
12. 北京戏剧史；
13. 北京风俗史；
14. 北京考古史；
15. 北京民族史；
16. 北京宗教史；
17. 北京佛教史；
18. 北京道教史；
19. 北京伊斯兰教史；
20. 北京基督教史；
21. 北京教育史；
22. 北京城市发展史；
23. 北京建筑史
24. 北京园林史；
25. 北京陵寝史；
26. 北京地理学史；
27. 北京交通史；
28. 北京城市生活史；
29. 北京建置沿革史；
30. 北京对外交流史；
31. 北京水利史；
32. 北京饮食史；
33. 北京服饰史；
34. 北京环境变迁史；
35. 北京音乐史；
36. 北京名胜史。

这些研究项目，只是北京专史庞大体系中的一小部分，今后随着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入，专史的项目也会不断增加。《北京专史集成》经过历史研究所论证之后，院领导又组织全院的专家学者对这个重大课题进一步加以论证，并且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对专史的撰写工作有很大帮助。

《北京专史集成》中的每部专史的含量，视其内容的多少，大致在30万字左右，有些内容较多的，字数可以多一些，反之，则会少一些。各部专史的时间跨度，一般始于远古，迄于新中国建立。有些部专史在撰写过程中，时间会有所下延。如《北京建置沿革史》，必须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才能够对今天北京政区的沿革状况有全面的叙述。各部专史的地域范围，也不是严格局限在今天的北京政区，而是根据不同朝代政区划分的变化而随之变化，如汉唐时期的幽州，辽代的南京析津府，金代的中都大兴府，元代的大都路，明清时期的北京顺天府，等等。政区范围的大小虽然会不断变化，但是其核心地区仍然是今天的北京。

《北京专史集成》的撰写，有很多难以处理的地方。例如，“专”和“史”的关系。“专”是指专门、专业，如在《北京宗教

史》中，“专”是指宗教或是宗教学，而“史”则是指在北京历史上曾经发生或是出现过的、与宗教有关系的事件或人物，当然也包括相关的典制。如在《北京宗教史》中，我们所研究的佛教史，主要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在北京地区的禅宗、律宗、净土宗等佛教流派的发展、变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这些佛教流派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其代表人物的社会活动、历代统治者和社会各界对这些宗教派别的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重要宗教事件，等等。我们认为，要想处理好“专”与“史”的关系，一方面，要掌握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又要对当时的历史状况有准确的认识，掌握宗教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正确认识不同历史时期宗教产生、发展和兴衰的变化历程。其他专史的撰写工作也是如此。

再如，“全国”和“地方”的关系，换言之，即“全局”和“区域”的关系。在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前，所有的北京史都是“地方史”，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有着明显的“区域”性质。但是，当北京成为全国首都之后，在北京发生的许多史事除了具有“地方”和“区域”的性质之外，又具有了“全国”或是“全局”影响的特质。如“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力之持久，显然不是局限在北京地区的。此外，由于北京的统治中心地位，有些发生在其他区域（甚至国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也会对北京产生巨大的影响。如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这些重大事件的始发地虽都不在北京，但其对北京的巨大影响甚至超过了在北京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因此，如何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在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确实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

《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立项后，得到了学术界和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首先，是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著名史学前辈在年事很高、工作繁忙的情况下，热情支持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慨然担任特聘学术顾问，并且对北京专史的撰写工作提出了珍贵的指导意见；有些史学前辈还在百忙之中审阅了部分书稿的内容。其次，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陈之昌主任和李建平副主任对本课题的重视，使《北京专史集成》得以被列为市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再次，本课题的出版工作得到了人民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出版经费较少的情况下，得以立项出版。特别是资深历史学编审张秀平女士和诸多编辑人员，认真审阅全部书稿，并且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



意见，为各部专史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批批老专家学者们为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他们的退休对北京文史研究带来了一些影响。但是，许多已经退休的老专家仍然坚持工作在科研第一线，笔耕不辍。《北京专史集成》中的一些项目就是以他们作为骨干带领年轻同志完成的。一批批青年学子陆续来到所里，他们在科研能力上尚需锻炼，在学术见识上亟待积累，但是，他们有朝气，有吃苦耐劳的干劲，有新的更加开阔的视野，假以时日，他们在《北京专史集成》研究中的成果将会越来越多。我相信，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热心帮助下，在历史研究所全体新、老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持之以恒，《北京专史集成》将会为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不断增添新的科研成果，为首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不断做出新贡献。

值此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建院 30 周年、《北京专史集成》开始出版之际，是为之序。

王岗

2008 年 10 月

# 前 言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著述之事是非常重要的。古人曾云：“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见《春秋左氏传》）“立言”者，即是著述之事。在有些古人看来，立德最高，立功次之，立言又次之，是有着高下之分的。但是笔者认为，三者皆是不朽的事情，并无高下之分。立德是根本，当然重要，但是，如果仅仅立德，而没有立功和立言的实践，立德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一个人的德行再高，如果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又有什么用呢？其实，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人的德行不纯厚，他是不可能立功和立言的，即使有些立功、立言的行为，也不能传之久远，而成为不朽之事。

立功、立言也是分不开的，立言本身就是一项很伟大的功业，孔子作《论语》，编《诗经》，皆为立言之事，其功业千秋标柄。汉代司马迁撰写一部《史记》，也是一项不朽的功业。不论是《诗经》、《论语》还是《史记》，都是立德的重要载体。无功、无言，德何以立？因此，三者之间是不能简单的分出高下的。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对“德”的认识和理解在不断发生变化，立功和立言的内容也会随之而不断变化。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擅长著述者是十分推崇的，故而不乏以一篇文章而名扬天下者，如唐代的王勃，即以一篇《滕王阁序》受到时人称赏而位居“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及骆宾王）之首。其实，细细读来，这样的文章仅以辞藻华丽见长，在此前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并不少见。因此，同为四杰的杨炯就不服气，曾对人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见《旧唐书·杨炯传》）同是唐代诗人的陈子昂，一篇《登幽州台歌》，未见华丽的辞藻，寥寥数语，却道出了

千古浩叹，其意境远胜于王勃。而同样以一篇文章名扬天下的宋人范仲淹，他的《岳阳楼记》，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襟怀表述出的崇高精神境界，与王勃的《滕王阁序》相比，更是高下立见。

古人对著述十分重视，同时对传世著述的整理也很重视。在中国古代人们的观念中，还没有现在的科学分类方法，只是依据当时人们的传统观念来分类，经过数千年的传承，最终形成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在这四大类之下，再分为若干细类。其中，史部著述与今天历史类的著述基本一致，而经部则包括了政治、哲学、思想文化、文字学等诸多门类的内容。子部和集部比较混杂，如佛教与道教等著述，属于宗教类，却被归入诸子之中，而诗文、戏剧等文学艺术创作，则被归入子部小说类与集部之中。对于各种著述分类方法的研究，目前被称为“目录学”，许多著名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人们治学的最基础途径。

对各种著述的分类，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这种标准的确定，表现出分类者的学术观念，有着很深奥的理论见解。大致而言，类目划分得越细，对著述的定位也就越准确。但是，中国古代人们的著述，并没有明确的学术范围界定，一部著述中，往往会包括许多门类的学科内容，因此，过细的分类反而会造成人为的不准确因素。所以，如何处理好分类与反映著述内容之间的关系，成为体现人们学术水准的重要坐标。目前人们通行的分类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另一种是现代的学科种类划分法。实际上，这两种方法各有优劣，我们认为，四部分类法更适用于古籍的分类，而学科种类划分法更适用于当代的著述。有鉴于此，我们这部《北京著述史》的撰写采取了两种分类方法并用的体例。

北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城市，它的特殊性是从其成为全国都城之后逐渐体现出来的，也就是从它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后才逐渐体现出来的。这种特殊性，就是它越来越多地受到全国、乃至域外众多人士的关注。这种对北京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人们的著述之中。因此，以往人们在研究北京著述史的时候，往往采用两个范围内的著述作为研究对象，一个范围是北京人的著述，另一个范围是描写北京的著述。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两个范围内的所有著述，都应该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

另一个必须确定的东西就是对北京著述史阶段的划分，我们也采用了人们通常研究历史的阶段划分法，即以朝代的变更作为阶段划分

的标志，而参考的另一个依据，就是目前存世著述的数量多少。在北京地区，辽代以前的时间跨度虽然很长，但是相关著述的数量却比较少，故而被合并为一章。辽宋金时期，北京开始从少数民族政权的陪都向首都转变，与宋朝的文化交流也比较多，故而合为一章。从元代开始，此后又历经明清两代，这里已经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所以各为一章。而到了民国时期，西方的学科分类方法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不仅这种著述分类方法得到了更多人们的认同，而且许多人的著述内容也受到很大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不同学科的方法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各种著述比较容易采用学科分类方法加以整理研究。因此，这个时期的时间跨度虽然不长，我们却把它与传统著述区别对待，采用新的学科分类方法进行研究。

就著述内容而言，两个不同范围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北京人的著述，内容不一定就是描写北京的，而其他（非北京人）的著述，则必是与描写北京有关才能够被收入本书之中。北京在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之后，一批又一批的文化精英从全国各地汇聚到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而长期生活在北京，甚至在北京的生活成为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人虽然不是出生在北京，实际上却已经成为不同时代的北京人。因此，在他们的有些著述中，对北京的描写内容甚至超过了对故乡的描写，乃至超过了北京人对自己故乡的描写。例如，清代朱彝尊编纂的《日下旧闻》一书，成为当时描写北京最为详细的巨著，而与之同时代的北京学者，包括著名的朱筠兄弟、黄叔琳兄弟等，皆没有可以与之相媲美的著述。

在北京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存留下来了浩如烟海的著述，通过这些著述，我们又可以了解到许多已经散佚的重要著述的一些基本情况。大致言之，明代以前的许多著述，往往散佚了，今天能够见到的只是一些辑佚本，如赵万里辑本《元一统志》、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析津志辑佚》等，有些则连辑佚本都见不到了，如元代的《经世大典》即是如此。而明代以后的著述今天虽然也有残损，如《永乐大典》等，但是，存留下来的著述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点，通过我们这部《北京著述史》是可以反映出来的。对于已经散佚的著述加以研究，难度是比较大的。而这部著述史毕竟不同于学术史，因此，在对相关著述进行研究时，只能就著述本身和著述者加以简要介绍，而不能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这部《北京著述史》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对于浩如烟海的著述

只能是择其重点加以研究，对于许多重要的著述，也不得不略去了。例如传统著述中的集部内容，应该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从元代开始，就有几百部重要的文人专集存世，明清以后的诗文集就更多了，在这些重要的文人专集中保存着大量对北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描述，但是，要想把这些重要著述逐一加以研究，显然是这部著作无法承担的，结果只能是挂一漏万，留下或多或少的遗憾。今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将组织研究所的同志们一起撰写一部多卷本的《北京著述史》，进一步加大学术研究的力度。

我们在研究著述的同时，自己也在从事著述，希望我们的著述能够给今后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王岗

2011年11月

# 概 述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作为浸透数百年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帝国古都、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人文荟萃，积淀了厚重博大的文化。北京著述作为记录北京历史、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地理、社会、风俗的文字载体，是北京特有的文化内涵的缩影与标志，最能展现北京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各个时期的历史特色，表现北京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品位，以及北京的特殊历史地位。

## 第一节 北京著述既往历史

北京著述的既往历史，悠长而久远。从周武王灭商封燕、蓟，建立燕国开始，直至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文人学者，千百年趾踵相接，著述作品浩如烟海，内容宏富广博。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光绪顺天府志》中，我们可以粗略梳理其概貌。伴随着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由低到高、从小到大的演进过程，北京的著述史也表现出渐变的特点。概而言之，五代以前是北京著述史的产生和初步发展阶段，辽宋金时期是北京著述史进一步发展阶段，元代的北京著述在数量、质量、种类上都臻于成熟，明代的北京著述进入兴盛时期，宫廷图书、官修、私撰的著述大量涌现。清代是北京著述史的鼎盛时期，数量多、门类全、质量高，精品倍出，无不引领全国风骚。

唐五代以前，是北京从燕国到帝京的重要演进过程，也是北京著述逐渐兴起和初步发展阶段。虽然与其后各代的著述相较，略显逊色，但却呈现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态势。先秦至五代时期，北京地区政权频更，经历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后赵、前燕、前秦、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等历史时期，军事和战争占据了重要地位。伴随着以中原政权为代表的中央政权力量的强弱和治乱，幽蓟或是北方的经济、贸易中心和北方的军事重镇，或是军事割据势力的中心，或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军事前哨基地，总体而言，“历史上的北京地区，在金明以前始终没有平静过，从燕国建立之日起，其内部的争权夺利，就已经使这一地区陷入不稳定状态，尽管有黄金台，有伐齐的胜利，但从燕国开始，变得很难稳定下来，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把这里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但哪怕是像唐代这样强有力的朝廷，也没有把这里变成鸟语花香的人间桃园。”<sup>(1)</sup>

在北京地区各政权处于更迭频繁，战乱频仍的历史背景下，唐五代以前北京著述的特点之一，是散佚众多。秦统一以后，秦始皇“下焚书之令”，原六国的史籍均遭损毁。其后，东汉末年、西晋永嘉之乱、隋末几次大规模的战乱，也导致书籍发生巨大的散乱。二是五代以前北京的史部著述多散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北齐书》、《新唐书》、《旧唐书》等正史中，其本纪、列传、志都有北京地区人物、事迹的记载。三是记载北京的书籍多，而北京人著述则相对少。《燕春秋》一书，是迄今为止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北京历史文献。北齐阳休之的《幽州人物志》是迄今所知的第一部北京历史人物传记，《幽州图经》与《幽都记》则是北京现存最早的地方志著述。四是“自汉魏以来，蓟城一带文化教育事业就比较发达，中原先进文化从这里向北方草原地区推广传播，历代都曾出现不少文化名人，这些为京师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sup>(2)</sup>儒家经典《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孟子》等皆有燕国始祖召公德政的记载，战国时期的燕国有纵横家苏秦、阴阳家邹衍等人活动并传播学说；西汉有燕人韩婴在燕赵一带传授《诗经》，被称为“韩诗”。西晋时范阳人张华，隋唐时期的张说、贾岛等都是闻名天下的文学家和诗人。东汉的高诱则是注疏经子之大家。五是五代前北京著述具有家族传承的特点。卢氏家族作为北方大族，儒学渊源深厚，族中人才辈出，直至唐代，卢氏一族在北京著述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如东汉经学家卢植名著天下，北齐卢景裕注《周易》10卷，并有《尚书注》、《孝经

注》、《论语注》、《老子注》、《毛诗注》、《春秋左氏注》行于世。隋唐时期的卢思道、卢照邻等亦闻名全国。

五代以前，因为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等制度化宗教传入北京的时间差别很大，传播与发展的情况亦不相同，因而各时期的宗教著述参差不齐。总体而言，唐以前相对较少。最早有幽州僧人昙无竭即释法勇的译书及所撰《外国传》5卷，燕籍僧人释宝儒、智梵、靖嵩等有南下洛阳等地求佛学者，其著述均称于一时。渔阳人灵询的《成实论删要》与《维摩疏记》亦颇盛行。唐代，幽州名僧增多，南下求佛者有幽玄、常遇、道膺，北上弘法者有智嘉、华严、真性、宝积、道宗、晓方诸僧。义净译有107部佛经，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5部著述，最为著称。名僧道辩、可止的佛教著述亦颇珍贵。东汉末，张角创立的太平道曾在幽、冀等8州发动起事，其后，蜀地“三张”的天师道也逐渐传播到北京地区，但五代以前的北京道教著述较为罕见，仅有南北朝时期寇谦之《云中音诵新科之诫》诸书流传于世。

辽宋金是北京著述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十一月，后晋石敬瑭遣使向契丹献燕云十六州图籍，同年，辽太宗耶律德光下诏以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幽州从此提升为辽朝的陪都，成为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宋宣和四年（1122年），金军攻占燕京。经宋、金双方交涉，宋以岁币等赎回燕京，并改称燕山府。宣和七年（1125年），燕山府再归于金。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称中都，燕京成为北半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后，金灭北宋，与南宋长期对峙，燕京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政治上的分裂和军事上的对峙，对北京地区的文化与著述发展影响很大。从数量上来看，辽南京并非契丹政权的政治中心，且由于占有的中原地域范围相对较小，汇聚到此的中原文人学者亦相对较少。金代，中都城已成为整个北方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汇聚到此的文人学者数量显增，著述亦比辽朝显增。从著述类别上看，辽宋金时期，北京的儒学发展与两宋相比差异明显，直到金朝后期，理学才开始传播到北方地区，因此，北京地区的学者对儒学的研究较少，经部著述亦少，金代北京地区作者尚无经部著述传世。

辽宋金时期，燕地史部著述相对较多。其一为前朝和当朝国史的编纂。金熙宗、金章宗时曾两次纂成《辽史》，但皆未刊印。金朝并任用参纂《辽史》之文人学士纂修当朝国史。其二为纪行之书，这是北京著述史上重要且有特色的组成部分。辽宋、金宋对峙时期，互派信



使，宋朝出使辽金的使臣归国后，需将出使过程中的应对酬答、行径路线及见闻等情况，笔录成书，上奏朝廷，称“行程录”、“奉使录”、“使北记”、“使北录”或“语录”。宋人奉使纪行之书达45种，是宋人了解辽、金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有大量有关北京的内容，史料价值颇高。宋人著述注重描述辽史、燕京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如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契丹国志》中《四京本末》。宋人亦关注金朝的崛起，如燕山史愿《金人亡辽录》、陈准《北风扬沙录》以及佚名《大金吊伐录》等。《平燕录》、《入燕录》等记录了宋军从金朝取回燕京之事。宋人著述亦多有记录金朝攻占燕京，攻取汴京，俘获徽钦二帝押送回燕京的历史。金与南宋对峙期间，一些降宋的金朝文人将所知金朝历史著录成书，以张汇、张棣、宇文懋昭的著述影响最大。

辽宋金时期，燕京地区的子部著述相对较少。金代子部著述比辽代略多，内容以医学类、宗教类、术数类为主。金代以前，北京道教著述较为罕见。辽代统治者推崇佛教，人称“菩萨国王”的辽道宗好佛法，撰有《大方广佛华严经随品赞》与《发菩提心戒本》。辽南京华严、密宗、律宗、净土、法相等诸宗并荣，著述以净土宗高僧非浊、法相宗悯忠寺高僧诠明、崇仁寺希麟、永安寺道殷为著。燕京僧人行均之《龙龕手鑑》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至金代，采取一定的抑制佛教政策，不再举行大规模的抄写佛经活动，金中都的佛教著述总体较少，以禅宗著述传世为多。但金代的佛经刻造与刊印却十分兴盛，如房山石经的刻造，许多贵族与官员戚属皆曾捐资刻经。

辽宋金时期，燕地集部著述比经、史、子部多，但多已散佚。宋人集部著述中，以扈蒙、刘载、赵曦、赵良嗣为最。辽代，辽道宗以及萧孝穆、萧柳、萧韩家奴、耶律履、耶律庶成、徒单镒等契丹贵族的文学修养较为深厚，其诗文在当时文坛影响较大。金代，女真贵族受中原传统文化熏陶较深，但著述较少，《金史》仅载完颜永成及完颜璫二人。活跃在燕京的文人学者如宇文虚中、高士谈、吴激、蔡松年父子、施宜生、马定国、曹望之、赵可、路铎、党怀英、赵沔、张行简、李晏、王庭筠、王寂、赵秉文、元好问等皆有著述。

元代，北京历史的发展经历了蒙古国和元朝两个阶段。蒙古国时期，燕京已成为江淮以北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活跃在燕京文坛上的，主要是北方地区的文人学者，著述数量相对较少。随着元世祖统一全国，元大都开始转变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活跃在大都文坛上的，则是全国的文人学